

“六个必须坚持”与城市历史文脉保护传承

师帅朋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055)

摘要:“六个必须坚持”为在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城市建设篇章中,更好保护传承城市历史文脉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城市建设进程中,把握好“六个必须坚持”,保护传承城市历史文脉,需要以历史文脉更好保护不断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以本土规划理论构建为文脉保护传承提供学理支撑,以辩证思维把握历史文脉保护传承与时代发展的关系,以历史思维直面历史文脉保护传承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以系统性举措整体推动历史文脉保护传承,以历史文脉保护的中国样本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

关键词:城市;历史文脉;保护传承

中图分类号:D64;TU9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92(2024)02-0024-07

城市历史文化文脉积淀着前人的智慧,见证着城市的历史,在城市建设中保护好历史文化文脉,传承文化基因,既是为城市注入文化养分、提升城市文化品位之举,更是不断满足城市居民精神文化需求、丰富人们精神世界之需。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召开之后,学界围绕城市历史文化保护传承问题的探讨更为密集。有作地域性探讨的,比如有学者结合上海、南京的城市特点,分别提出保护上海在不同发展时期所形成的文化多样性和城市包容性^[1],提出对南京城市历史文化景观持续活化利用的策略^[2]。有作总体性探讨的,比如城乡规划领域的权威期刊《城市规划》曾邀请多位该领域学者围绕“城乡规划建设与文化遗产”这一论题展开探讨,并形成了诸多基本共识:要以文化思维去谋划城市空间的布局和建设,要保护好现在的城市遗产并重视其活化和利用,要以新的文化空间创造为文化复兴提供物质空间支撑,要发掘中国城乡规划建设思想中超越时空的学术价值等^[3]。2021年8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后,学界的探讨更为广泛。有学者从学理角度提出构建中国本土城市规划学术体系的观点^[4],有学者提出构建城

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是破解当前保护传承问题和困境的必然选择^[5],也有不少学者从实践维度出发,针对某一具体案例提出历史文化保护的具体举措,诸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举措^[6],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举措^[7],历史建筑保护举措等^[8]。

2022年召开的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要“加强城乡建设中历史文化保护传承”^{[9]45}。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六个必须坚持”,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概括,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作出的战略部署,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城市建设新篇章,回答好何以更好保护传承城市历史文脉的“时代之问”,要求我们在历史文脉的具体保护传承实践中自觉把握好“六个必须坚持”。也即保护城市历史文脉必须要坚持人民至上,坚持问题导向,立足基本国情,从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要出发,在本土探索实践中,挖掘总结中国传统规划经验智慧,解答当下实际问题,并以自信自立的态度勇于建构中国本土城市规划理论;另外,在处理城市历史文脉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时,必须要坚持系统思维,以系统性举措处理好“守正”与“创新”的关系,积极扩大传播保

收稿日期:2023-08-25

基金项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研究开发项目“省级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规划编制的关键技术研究”(2022-K-063)

作者简介:师帅朋(1984-),男,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中国城乡建设与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博士,研究方向为红色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E-mail:397032243@qq.com

护传承的新实践、新理念,以胸怀天下的气度,为解决世界城市历史文脉保护传承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中国样本”和“中国方案”。

一、坚持人民至上,以历史文脉更好保护不断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城市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伴随着人们交往实践的不断深入,城市因人们交往需求而诞生并随着交往需求的扩大而得到新的发展。法国哲学家卢梭同样看到了人对于城市发展的重要性,曾直言道“房屋只构成镇,市民才构成城”^{[10]100}。无论是基于历史还是现实的考察,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而言,人都是城市建设的最终目的和归宿,因而满足人的需求理应成为城市规划建设的首要出发点。

随着时代的演进,人们对美好城市生活的需求无论是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在拓展,步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以及人们对美好城市生活的新期待,均印证了这一判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城市建设思想,是人民至上理念在城市建设发展领域的具体体现,为新时代我国城市建设发展提供了根本指南。党的二十大系统擘画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并提出将“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那么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大版图下,城市在建设发展中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必须同步创造更多、更丰富的精神文明,以不断满足和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事实上,城市本身就是创造精神文明的重要场所,恰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11]556}。城市显然是精神劳动的主战场,也理应是精神文明的主创地。

丰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离不开资本和市场的有力驱动,但仅靠资本和市场的力量,特别是在创造精神文明的过程中会显得捉襟见肘,甚至显露出弊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呈现出人民逻辑,正是有效对冲城市建设中资本逻辑带来的弊端和消极影响的重要理念。这自然对城市治理者提出了更高要求,即在市场经济、物化时代、资本逻辑的背景下

决不能忽视人的精神世界,需要引入人民逻辑,不仅要关注城市创造的GDP总量,或是人均GDP数量,还要关照到生活在城市里人们的精神满足、心理平衡与情感寄托。仅就后者而言,需要一个城市在规划建设中特别是在实现高质量发展中,要特别注重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让人们的情感、乡愁有安放之处。

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是前人智慧的积淀,是城市内涵、品质、特色的重要标志,也是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求、丰富人们精神世界的重要物质载体。遗产虽为“陈迹”,但并非遗骸,而是构筑为一个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恰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一个城市的历史遗迹、文化古迹、人文底蕴,是城市生命的一部分。文化底蕴毁掉了,城市建得再新再好,也是缺乏生命力的”^{[12]113}。这就要求我们,一是要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城市建设进程中,保有城市生命体意识,将城市的历史遗迹、文化古迹、人文底蕴视为一个城市生命体的“遗传信息”,不仅不是城市的负担,反而是城市留住特色、持续发展、走向未来的重要支撑和关键要素。二是要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在保护传承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中守护好城市文脉,营造更具文化品位的城市生活环境,把工业文明笼罩下的现代城市转变为充满历史文化气息的人文城市,不断满足人们对于美好城市生活的新需求,特别是对精神文化生活的新需求,使新时代的城市历史文脉保护传承既得到人民认可又经得起历史检验。

二、坚持自信自立,以本土规划理论构建为文脉保护传承提供学理支撑

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城市建设篇章,更好解决城市规划建设中历史文脉保护传承的问题,离不开中国优秀城市规划传统智慧的指导。在数千年历史演进中,中国的城市规划形成了自己的传统,蕴藏了中国人的城市观和独特的价值追求。欧洲尚处中世纪时期,中国已经诞生了世界上最辉煌的城市,唐长安城仅就城市规划和建设水准而言,已经“奠定了亚洲东方城市的‘标准’及样板”^{[13]46};明清时期的北京城,在城市规划和设计上的成就,集我

国都城形制之大成,代表着我国封建社会后期都城发展的新高峰。

只是近代以来,由于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在中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冲突中,中国城市规划传统的价值与地位未得到应有尊重。工业革命给西方城市带来了历史性变革,英国城市规划学者彼得·霍尔认为,现代城市规划和区域规划发端之肇因,是为了解决18世纪末工业革命所引起的特定社会和经济问题。照此逻辑,工业革命诞生于欧洲,当工业化在西方各国渐次展开之时,近代中国尚处于闭关自守的农耕社会,自然谈不上有任何的现代城市规划理论。

西方率先开辟现代城市规划体系的理论,并不意味着西方的城市规划体系、价值观念、模式就是建设现代化城市的唯一标准和样式,西方城市规划理论自身也不是线性发展而是多向性的,也要因应各地具体情况的变化而变化。中国规划在数千年历史演进中形成了自己的传统,蕴藏了中国人的城市观和独特的价值追求,这其中所蕴含的中国优秀城市规划传统智慧有其鲜明特色,诸如结合自然山水的城市规划、城市人文空间规划、城市古迹保护与文化遗产、城市生态环境的保护与修复、城市规划建设中“循吏”的贡献、城市规划的“文人+匠人”模式、城市规划建设中的中华美德等,在与西方城市规划理论相较中,已经显现出独特优势来。随着我国逐渐从世界舞台的边缘走向中心,特别是在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城市建设篇章、推动城市历史文脉保护传承中,我国优秀城市规划传统智慧的价值和地位也势将重新显现。对此,我们要立足“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大历史观,从改变“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历史境遇和奋斗历程中审视这一历史进程^[14],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规划理论自当有这种学术自信。

面向未来,更好保护传承城市历史文脉,我们的城市规划建设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城市建设中面临的问题,特别是历史文脉保护传承中面临的问题,必须要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在自己的探索实践中来解答。这就要求我们,一是要深度挖掘中国历史城市的规划传统,发掘中国城市规划中跨越时空且具有恒久价值的优秀规划思想与方法,将其更好地运用于现代城市规划建

设特别是城市历史文脉保护传承实践中。二是要立足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城市化实践中所形成的理论,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充分吸纳5000多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规划智慧,使之成为现代规划理论的有机组成,逐步形成中国本土规划学术体系,实现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样本”、构建“中国话语”,为在城市规划建设中更好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保护传承城市历史文脉提供学理支撑。

三、坚持守正创新,以辩证思维把握历史文脉保护传承与时代发展的关系

英国城市学者迪耶·萨迪奇在其《城市的语言》一书中写道,当一个城市真的呈现出充满戏剧性变化的新形式时,能在何种程度上保持原有的精髓才是衡量它成功与否的标准^{[15]232}。美国城市规划理论学家刘易斯·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中亦指出,城市不只是建筑物的集群,它是各种密切相关并经常相互影响的各种功能的复合体——它不单是权利的集中,更是文化的归极^{[10]91}。当现代工业文明成为城市最显著的标识,并在不断地创造出新的城市文化后,如何处理好传统与现代、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如何保持城市“原有的精髓”,实现文化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的平衡,是全球城市发展进程中普遍面临的“时代之问”。

正在经历着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城镇化进程的中国,回答好“时代之问”,科学处理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守正创新这一理念为我们科学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全新指引。从守正和创新二者的内涵实质来看,“守正”是防止在城市规划建设中将历史文化遗产作为城市建设的“负担”予以破坏,要守住城市的文化根脉;“创新”则在于充分认识、把握、遵循城市规划建设与文化保护传承客观规律的基础上,为城市增添新的文化内涵、时代特征,实现城市的高质量发展。从二者的辩证关系来看,“守正”不是因循守旧、默守成规,而是根脉的传承、文化的延续;“创新”不是另起炉灶、自成一体,而是继承中孕育创新,既内蕴传统底色又彰显时代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爱惜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12]113}，“要妥善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12]114}。这一重要论述实际上便是守正创新理念在城市历史文化保护传承领域的逻辑展开和生动运用。贯彻到具体的城市规划建设实践中，这就要求我们，一是要善于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出发，用好辩证思维，自觉看到保护与发展之间客观存在的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主动寻求保护与发展之间的平衡点，既不能离开科学保护一味强调现实需要，又不能一味强调保护却忽略其现代价值利用，而是将城市的历史遗存与当代生活共融，让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共鸣，从而在文明传承、文化延续中，实现城市“物”的保护和“人”的发展的和谐统一。二是就一城之建设实践而言，要妥善处理好古城的“守正”与新城的“创新”之间的关系。古城中之要注意分类实施遗产空间活化利用，促进古城与现代人居生活有机融合，做好“守正”；新城新区规划建设要体现历史传承，将新的标志空间、关键地段建设与传统城市山水人文空间格局秩序有机呼应，彰显城市特色，做好“创新”。

四、坚持问题导向，以历史思维直面历史文脉保护传承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城市见证着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演进，凝聚着一国之民族精神，承载着区域的文明传承，西方学者更是直接认为“城市就是文明”^{[13]13}。但自人类步入工业革命之后，现代城市规划体系伴随工业化发展风靡全球，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下，一味追求现代城市带来的便捷、效率和利益，却忽视了本土文明城市体系的重要理念、原则和方法，城市特色出现危机，文化传承面临挑战。

马克思曾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1]470-471}城市文化的迭代更新是城市发展进程中的历史必然，是一种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但城市无

论如何更新都不应脱离其所固有的文化底蕴。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便提出“割断历史”^{[16]534}之举不是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者所为的。进入新时代后，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强调指出，要“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全面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17]。

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版图中，城市现代化无疑是“主战场”，是绘制中国式现代化完整图景的主色调。中国作为一个拥有着灿烂文化、文渊文脉流淌不息的文明型国家，不少城市都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进，积淀了丰厚的遗产，在当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城市建设进程中，需要高度重视“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城市的历史文化遗产，并以礼敬的态度对待城市的历史文化，如此千年文脉方能在赓续传承中焕发时代生机。

马克思曾指出：“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18]289}历史不能割断，文化需要敬畏。在城市规划建设中如要更好继承过去留下来的条件，则迫切需要我们坚持问题导向，以“回头看”的历史思维全面梳理“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在当下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一是要看到因认识不足带来的弊端，如不少城市在建设中，文化空间意识淡薄，片面地认为现代化就是所谓高楼大厦化，在规划建设中贪大媚洋求怪，失去了“自我”和独特的文化标识，导致城市建设“同文化越来越远，同浮华越来越近”^{[12]109}。二是要看到受经济利益驱动等因素带来的弊端，如不少城市一味追求经济效益，在推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上投入不够、动力不强，保护工作整体性和系统性不足，遗产保护常常为经济发展“让路”，屡遭破坏，给城市肌理和个性特质带来了难以挽回的损害。三是要看到理论缺失带来的弊端，如由于中国传统规划理论的缺失，习惯于用西方规划理论指导中国的城市建设，导致城市规划建设“同传统越来越远，同西化越来越近”^{[12]109}，难以适应规划建设富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未来城市建设需要等。这些问题和挑战正是在中国式现代化城市建设进程中所要解答和应对的。为此，我们要聚焦城市规划建设中历史文脉保护传承所遇到的问题，勇于探索解决问题的新思路，努力答好时代之问，交出优异答卷。

五、坚持系统观念,以系统性举措整体推动历史文脉保护传承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事物之间的联系具有普遍性,任何事物都不能孤立存在,都要与其他事物发生相互作用,整个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城市作为一个区域乃至一个国家人民群众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的中心,其本身所包含的要素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复杂系统体,因而城市工作便成为“一个系统工程”^{[12]31}。在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城市建设篇章中,在城市规划建设中做好历史文脉保护传承,实现二者的统一,同样是一项涉及到多方面、具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复杂系统工程。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只有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规律。”^{[19]20}系统观念作为唯物辩证法事物普遍联系观点的哲学表达,为推进城市历史文脉保护提供了富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当下随着城市现代化发展水平越来越高,历史文脉保护传承工作的系统性特征也越来越突出,系统中的制度、文化、人才等要素已成为事关保护传承工作质量的关键要素。

这就要求我们,在具体的城市建设实践中,要善于把握保护传承工作的关键性要素,系统性整体推进城市历史文脉保护传承。一是在制度要素上,坚持高位谋划,强化整体观念,研究出台在城市规划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整体性保护的办法与标准。警惕在规划建设中出现以特定时期的主题、风貌取代丰富多样历史文化信息的情况,注意留存不同时期的重要历史痕迹和生活记忆,妥善维护城市与地域山水、人文景观有机协同的整体结构秩序,为统筹协调城市中各项零散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框架性指导。二是在文化要素上,注意“循吏”精神的弘扬,筑牢中华文化立场,增强家国情怀和守土意识。在中国历史上,从周公营洛,到宇文恺营造大兴和洛阳,再到白居易、柳宗元、范仲淹、苏轼等的城市实践,均展现出中国文人规划城市的大脉络,对中国城市规划建设影响极深。当今的城市规划建设,有必要承继优良传统,注重当地文人对城市文化空间规划建设的参与,在激活中国文人规划传统中,

以文化的思维谋划事关城市历史文脉保护、传承和创新的前瞻性问题,成为一方城市规划建设与文化保护传承的“守道人”。三是在人才要素上,培养具有中国意识、中国精神和家国情怀的规划师。高校城市规划的教育模式与国际逐渐接轨的同时,中国课程内容应该具有独立的知识地位^[19]。但也需明确的是,我们的人才培养不是拒斥西方规划理论,而是在中西融合、古今融通中培养熟悉中国传统规划智慧、具备国际视野、掌握现代规划理论的当代规划师,为未来的城市规划建设和历史文脉保护传承做好人才储备。

六、坚持胸怀天下,以历史文脉保护传承的中国样本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

城市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其建设发展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开放包容、文化积累的过程。今天的城市是历史城市的延续,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各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名城都留下了丰厚的历史遗产,积累了丰富的规划经验。作为一个拥有着5 000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自然也不例外,不仅拥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而且积累着彰显中华文化精神的独特规划理念。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国正在以自己的伟大实践创造自己的“民族历史”,同时也是在创造崭新的“世界历史”。因而,在人类文明新形态视域下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如果我们探索出了城市规划建设中历史文脉保护传承的“中国样本”,其同样具有世界意义。恰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20]27}。

因此在中国式现代化城市建设进程中,中国优秀城市规划传统智慧在世界城市规划体系的总体谱系中,不仅不应缺席,还应当占据符合中国国际地位的应有位置、作出应有贡献。我们需要从引领人类文明的高度,推出更多的“中国理念”“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特别是伴随着中国方案、中国理念、中国主张的密集出场,中国本土规划思想创造也理应走出民族性的逼仄处境,开拓出人类性的宏大视野,在世界城市规划的知识体系、话语体系图谱中绘就自己的篇章、

做出自己的贡献。面向未来,这就要求我们:一是要坚持胸怀天下,在立足中国大地寻找解决中国城市规划建设中历史文脉保护传承问题方案的同时,积极拓展世界眼光,深刻洞察世界城市历史文脉保护传承中的进步潮流,积极回应城市发展中人们对城市历史文脉保护传承的普遍关切。二是要始终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一切文明在推动城市历史文脉保护中形成的有益经验,坚持洋为中用,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虚心学习借鉴吸纳,在融通中外中挖掘好中国优秀规划传统背后的文化“基因”和蕴含的规划智慧。三是要把中国优秀城市规划传统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规划精髓提炼出来,创造富于中华文化立场、具有时代特征的中国本土规划体系,让世人从我们的城市规划格局、风貌特色、建筑风格中感悟到中华文化的味道,从城市的精神内涵、文化基因中领略到中华精神和中华文脉的延续,让中国本土城市规划体系同各国城市规划理论一道,为人类创建更加美好的城市提供指引,为解决世界城市历史文脉保护传承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中国样本”和“中国方案”。

综上,“六个必须坚持”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概括,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城市建设进程中,保护传承好城市历史文脉,必须要把握好“六个必须坚持”,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具体体现在,要通过对城市历史文脉的更好保护,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要通过构建本土规划理论为城市历史文脉保护传承提供本土学理支撑,要在历史文脉保护传承中辩证把握保护传承与时代发展的关系,要直面当前历史文脉保护传承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要坚持从联系的观点出发以系统思维整体推动历史文脉保护传承,要努力打造历史文脉保护的中国样本,从而为世界城市历史文脉保护传承贡献中国智慧。

参 考 文 献

- [1] 张松. 上海名城保护复兴与人文之城形成刍议[J].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30(6): 93-100.
- [2] 杨俊. 南京城市历史文化景观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研究[J]. 城市发展研究, 2019, 26(11): 80-86.
- [3] 王树声, 石楠, 张松, 等. 城乡规划建设与文化传承[J]. 城市规划, 2020, 44(1): 105-111.

- [4] 王树声. 中国本土城市规划学术体系构建研究[J]. 城市规划, 2023, 47(2): 4-9, 37.
- [5] 王凯. 新时期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构建探索[J]. 城市规划, 2022, 46(S2): 6-13.
- [6] 田家兴, 郝静, 单彦名. 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市域历史文化资源空间保护体系构建探索——以山东省聊城市为例[J]. 城市发展研究, 2022, 29(1): 60-65, 81.
- [7] 李向北, 杨星莹. “慈云老街”传统历史文化街区规划设计——一个基于城市形态类型学方法的实践探索[J]. 城市发展研究, 2019, 26(4): 12-16, 21.
- [8] 付涌, 张怡欣. 基于价值呈现的历史建筑保护真实性思考——上海康定东路85号张爱玲故居修缮设计为例[J]. 建筑遗产, 2023(2): 140-149.
- [9]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 [10] 刘易斯·芒福德. 城市发展史: 起源、演变和前景[M]. 宋俊岭, 倪文彦, 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5.
- [11]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卷(1848-1859年)[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2]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关于城市工作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3.
- [13] 张庭伟, 田莉. 城市读本: 中文版[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3.
- [14] 孙正聿. 从大历史观看中国式现代化[J]. 哲学研究, 2022(1): 5-11, 125.
- [15] 迪耶·萨迪奇. 城市的语言[M]. 张孝铎, 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20.
- [16]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17] 习近平春节前夕赴山西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N]. 人民日报, 2022-01-28(01).
- [18]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0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2.
- [19] 吴志强, 于泓. 城市规划学科的发展方向[J]. 城市规划学刊, 2005(6): 2-10.
- [20]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7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Six Musts” and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Urban Historical Context

SHI Shuai-peng

(School of Marxism, Xi'an Univ. of Arch. and Tech., Xi'an 710055, China)

Abstract: “Six Musts” provides the scientific worldview and methodology for better protecting and inheriting the urban historical context in writing the chapter of urban construction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Accordingly, in the process of urban construction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uphold “Six Musts” to protect and inherit the city’s historical context. The historical context should be better protected to constantly meet the spiritual and cultural needs of the people. The local planning theory should be formulated to provide academic support in the context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Critical thinking should be used to grasp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historical contex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Thereby, we should confront th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facing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historical contexts with historical thinking, push forward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historical context as a whole with systematic measures, and contribute Chinese wisdom to the world with Chinese samples of historical context protection.

Key words: city; historical context;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编辑 王思齐】

(上接第16页)

[31] 习近平. 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23-12-27(02).

[32] 习近平. 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N]. 人民日报, 2017-01-19(02).

[33]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M]. 北京: 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 2023.

On the Implication of People-centeredness in Xi Jinping’s Cultural Thought

LI Xue-lin, BAI Qiu-mei

(School of Marxism, Southwest Petroleum University, Chengdu 610500, China)

Abstract: Xi Jinping’s cultural ideas are a new cultural chapter in Xi Jinping’s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the new era, through which the people-centeredness is a distinct mainstay that contains a profoun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practical needs. Now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larifying the implication of people-centeredness, highlighting people’s status and enhancing people’s self-confidence to gain insight into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f the “Two Integrations” and the “Global Civilization Initiative”, the work deployment such as the “14 commitments” and the “7 efforts”, as well as the people-centeredness in great cultural practices since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On a new journey in the new era, the people-centeredness in Xi Jinping’s cultural thought provides ideological weapons to boost people’s self-confidence for the cultural innovation and creation of the whole nation, guides people’s practice with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cultural power in the new era, and also contributes Chinese wisdom to promote cultural exchange among countries and to build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of mankind.

Key words: Xi Jinping’s cultural thought; people-centeredness; the “Two Integrations”; cultural confidence; cultural exchange and mutual learning

【编辑 吴晓利】